

## 十二、结语—知难行易的军事上证明

国父的革命战理,真是博大精深,我的研究,暂止于此。惟对「知难行易」的学说,我想在这里试从军事上给它一个证明。这个学说是有其普遍性与必然性的「凡知皆难,凡行皆易」的一贯学说。国父为建立他这个学说,便着孙文学说一书。不惮其烦,连篇累牍,列举饮食、用钱、作文、建屋、造船、筑城、开河、电学、化学、进化等十大例证,使人人容易了解「行之非难,知之维艰」的道理。并打破过去「知之非难,行之维艰」的谬说。又从人群的进化上作进一步的证明,就时的方面分为:「第一由草昧进文明,为不知而行之时期。第二由文明再进文明,为行而后知之时期。第三由科学发明之后,为知而后行之时期。」此三时期,以第三个时期为历史发展最难的时期,足证知为难,行为易。就人的方面分为:「其一先知先觉者,为创造发明。其二后知后觉者,年仿效推行。其三不知不觉者,为竭力乐成。」此三系人,在古今社会上都以第一系人为数最少,亦为知难行易学说之左证。还有,国父所谓「知」,决不是泛泛的知,空谈的知,乃「真知」,即科学的知。正如国父说:「真知特识,必从科学而来也。」又说:「倘能由科学之理则,以求得其真知,则行决无所难。」其意在勉人力行。

依上所述「知难行易」的道理,我们也可以在军事上找到证明:发明射击原理较实行射击难。策定作战计划较执行作战计划难。设计架桥难于执行架桥。设计要塞难于构筑要塞。定典范令难,行典范令易。(你看典范令不知是积多少次战役的经验教训及多少专家的心血而成)推而至于发明飞机、大炮、坦克、雷达、飞弹及原子弹等亦比制造和使用为难之又难。至于军事的进化亦可分为「不知而行」,「行而后知」及「知而后行」的三个时期,即由古代的「不知而行」时期,进化到中古的「行而后知」时期,再进化到近代科学发明之后的「知而后行」时期。就军人说,亦可把最高统帅普通军官及士兵各阶级分为先知先觉,后知后觉及不知不觉者,由于此三系军人相需为用,协同一致,当可完成战胜攻取的任务。凡此均可证明军事上的一切,亦为「知难行易」。在这里我们更应明白的,像孙子兵法十三篇与克劳塞维慈的战争论,实为千古不朽的两大兵典,历代名将的功业虽有驾乎两氏之上者,理论上而能驾乎两氏者实无一人,亦足证「知」的难能可贵,孙克两氏为先知先觉的兵学大师。又从孙克两氏的理论来看,如孙子说:「知彼知己,百战不殆;不知彼而知己,一胜一负;不知彼,不知己,每战必败。」

克氏说：「苟欲成为一个优秀的指挥官，亦必须具有优秀的智力，其阶级愈高，则所需要的智力亦愈大。」亦可证明「知」的重要性。其次像孙宾的减灶计，田单的火牛计，韩信的背水阵，孔明的空城计，李愬雪夜入蔡州，拿破仑的越阿尔卑斯山，汉尼拔导演的康纳歼灭战，兴登堡指挥的坦能堡歼灭战，这都是证明他们是先知先觉的名将，为历代军人所罕见者。又，当先知先觉的统帅所策定的战略战术来杀敌取胜，部属因限于后知后觉或不知不觉，往往不知其所以然，直至战胜之后，仍有不知其所以致胜之道，正如孙子说：「因形而措胜于众，众不能知，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，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。」所以一个军队在先知先觉的统帅指挥之下，全体部属只有恪守纪律，奉行命令，绝对不容有所怀疑犹豫于其间。

国父知难行易的学说，真是千古不刊的定理，此学说推演出的结论：一是「能知必能行」，一是「不知亦能行」，一是「有志竟成」，都是我们革命军人应常把握着的。先说「能知必能行」：前面已说过国父所谓「知」，是真知，即科学的知。国父又说：「科学的知识，不服从迷信，对于一件事，须用观察和实验的方法，过细去研究，研究屡次不错，始认定为知识。」（「国民要以人格救国」讲词）所以我们军人的智识学问，不是徒在书本上死读死记，及在课堂专心听讲，所可切于实用，须从实地观察，实地演习，或在实战中去理解它，去把握它，然后才不会重踏赵括徒读父书的覆辙。克劳塞维慈说：「一切智识虽然大半得自推究事物的性能，而一切事物的效用必待经验而后知，尤其是军事智识的基础在经验，所以兵学是经验的科学。例如火药的效用，如离开经验只凭想像与测算，实难得知其真相。所以自古以来，一切物质兵器的效果，必须反复试验。子弹借火药之力一秒钟飞行千尺，固可用测算而知，然其受空气与重力的阻碍命中目标实际的效果，必由经验而后知，物质的效果如此，精神的效果也是一样。」又说：「所谓危险，所谓劳力，所谓情报，所谓障碍，都是战争特质的元素，从它们妨害战争动作的作用上而观，可总称为障碍，要如何方能克服这种种障碍，一言以蔽之曰：「习惯」，惟有惯战能使身体忍耐大劳苦，惟有惯战能使精神抵当大危险，惟有惯战能使判断不为眼前印像炫惑。例如吾人初入暗室，瞳孔放大，吸收所有的发光体，渐渐能辨别诸物和明处一样，惯战的情形大概是如此的。战争的习惯，也可以由平时适当的演习，得着类似实战的经验，这要在演习中使各种障碍的一部份出现于实际，使指挥官磨练其判断力与用意的周到，可以得很大的利益。」这样所得的军

事智识学问，才是真知，科学的知，自然可以达到「知之必能行之，知之则更易行之」的境地。所以我们革命军人今后的求知，决不可读死书，应从演习上去求知，绝不可怕战，应从战场上去求知。这样的知，才是百战百胜的「知」，才是建功立业的「知」。

虽然「能知必能行」，但「不知亦能行」（包含知不完全的意思）。比如对敌人情况不明的时候，如下最大决心，实行冒险攻击，亦可以压制敌人，并可以从攻击等行动中去获得更真确的情报，以为我进一步行动的根据。假设我们因对敌情不大明了，必待取得更完备的情报然后动作，固会错过「战胜之本」的宝贵时间，反会给予敌人以获得关于我更真确的情报的机会，又会丧失敏捷攻击及初步获胜的利益。至于「有志竟成」，这是教我们要完成任务，建功立业，必须立下坚定不拔的意志，发挥整个精神力量来实践力行。否则敷衍塞责，畏难怕死，决无成功之理。所以国父说：「夫事有顺乎天理，应乎人情，通乎世界之潮流，合乎人群之需要，而为先知先觉者决志行之，则断无不成者也。此古今之革命维新兴邦建国等事业是也。」依此而论，我们此次反共抗俄，就是「顺乎天理，应乎人情，适乎世界之潮流，合乎人群之需要」的大事，又为先知先觉的最高领袖领导大家一致奋鬪到底，必可取得最后胜利，将如国父发动推翻满清，中经十次失败，终底于成。

最后，国父致力国民革命，凡四十年，他以超卓的天才，远大的眼光，高深的学问，丰富的经验，精勤的努力，在立德立功上是不朽的，在立言上也是不朽。他的战争理论，继承中国固有兵法的精神，吸收世界各国兵学的精华，加以自己的实践独创而成。他本着他的战理战法，推翻了满清，又完成了每次讨贼军事的胜利，所以他的战理战法，是必胜的，又是救国救世的。这是五千年来中国兵学上的一大飞跃，也是说明反共抗俄战争依此而行必可得到最后的胜利。

我们要研究和发扬国父的革命战理，  
我们要运用和实践国父的革命战理。